

傳記文學叢刊

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

邵玉銘著



邵玉銘著

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

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

傳記文學叢刊之五十五（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

精裝每冊定價新臺幣一百元
平裝每冊定價新臺幣六十元

著者：邵 玉 銘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巷四號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一〇八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一日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一九號

傳記文學叢刊之五五（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

精裝本全一冊新台幣一〇〇元

平裝本上下兩冊每冊六〇元

著者：邵玉銘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一一〇八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719 號

序 言

關於近世中美關係之演變，一向爲著者所注意。一方面是學術上的興趣與專業，二方面是與自身與國家命脈有關。數年以來曾寫過不少學術性與政論性的文字，本書所選均爲中文作品，且均爲學術性文字，至於政論性的文章，也許將來有機會再將之彙集成冊。

本書所選各篇，除第三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尙未發表外，其餘已大都見諸報刊（在每篇之後著者特將原發表書籍或刊物名稱及期數列出），現在所以將之或修正或改寫以出書，不過是想供給關心中美關係人士參考的方便，以及爲自己留下一點記錄而已。不成熟的地方，尙請海內外碩彥先進指正。另本書在臺出版，著者遠在國外，無法親自校正，如有錯誤，尙請讀者原諒。

在此著者必須謝謝一些良師益友。前政大法學院院長朱建民先生，曾首先啓發我對研究中國外交史的興趣；在美求學期間，前佛萊契爾法律外交學院美國外交史教授 Ruhl J. Bartlett 先生、芝加哥大學前中國現代史教授（現任教於哈佛大學）Philip A. Kuhn 先生，及該校外交史教授 Akira Iriye 先生，均對著者在研究中美關係上多所指導。至於益友中丘宏達、關中、張京育、王紀五、朱炎等教

授，亦給予各種協助與鼓勵，這是著者不能不在此再三表示感謝的。中國時報楊社長乃藩先生的各種厚愛，亦極爲可感。

傳記文學社劉社長紹唐，多年來即在其主辦的「傳記文學」中刊登過不少有關中美關係問題之文章，其對此一專題之研究，可謂貢獻良多，著者承其愛護，出版本書，盛情厚意，至爲銘感。

邵玉銘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於美國聖母大學。

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 目次

一、序言·····	一
二、第一篇：宗教與美國對外擴張主義·····	一
三、第二篇：二十世紀中美關係中的假想 (Myth) 與事實 (Reality) ·····	一九
四、第三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	四三
五、第四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簽訂、終止與後果·····	一一一

宗教與美國對外擴張主義

——兼論傳教士與十九世紀以來之中美關係

基督教及美國傳教士對近代中國之影響不可謂不大。僅以人物而論，現代中國之領袖人物，如孫中山先生、蔣中正先生等人均受其影響而成基督徒。十九世紀的丁韋良 (W. A. P. Martin)、廿世紀的司徒雷登，俱是美國傳教士對中國有影響力的人物。鑒於傳教士對現代中國文化及政治均有所牽涉，實值得加以研究。

不過歷來我國學者對美國傳教士之研究多側重其在中國之影響，而對其教會在美國歷史上的地位則鮮少論述。本文的目地，在求多少補充此一空隙；至於天主教團體及其傳教士在其本國歷史的地位，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另本文討論期間約為十九世紀初年至一九三〇年代為止。此文前半部原為英文，由趙春山教授譯出。

一、宗教與美國對外擴張主義

美國一史學家說過：「美國海外傳教士似乎是美國歷史上的隱形 (invisible) 人物」①。此一語

道盡傳教士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爲了解傳教士的背景及其地位，首先，我們必須研討基督教會和美國政府或政治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傳教的團體——「美國海外傳教工作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創立於一八一〇年。首先到達中國海岸的兩名美國傳教士是在一八三〇年，較基督教最早自英國來華的傳教士摩理森(Robert Morrison)晚了十年以上^②。到一九三〇年代時，美國傳教士增至三千人，其數目遠超過來自英國的傳教士。在一八三〇年代時，美國社會給予傳教士的財政支援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到一九三〇年時代，傳教士獲得的經濟支持，高達每年數百萬美元^③。爲什麼教會業務成長的如此之速？教會團體及傳教士在美國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爲何？吾人願針對這些問題詳述已見。

由於法國大革命的混亂與血腥氣息，使得英國的政治變得更爲保守，即使是年輕的美國也受到同樣地感染。一七八九年憲法之所以批准，可以說是保守的資產階級與農村民主利益之間的政治妥協。年輕的美國政府當時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維繫共和政體的法律和秩序。與此政治上保守主義並行產生的乃是宗教上的保守主義，此一現象特別表現在新英格蘭各州內的農業地區。

爲了反對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的自然神論(Deism)，反對法國大革命表現的反宗教情緒，以及反對在波士頓及其附近地區單一神論(Unitarianism)的興起，美國基督徒遂響應英國十九世紀前後的福音傳播運動，而興起了宗教的保守主義^④。此宗教保守主義的主旨在於拯救世人靈魂，

得識眞主，較重天國的盼望而不重人世的追求。此主義的具體表現，便是「美國海外傳教工作理事會」(ABCNM)在一八一〇年的創立。在一八一二年十一月，這個理事會對其基督徒大眾發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該理事會解釋其國外傳教的目標如下：

「凡是能直接促進不朽，靈魂得救的事物，都是非語言所能表達，非理智所能想像的。有誰能夠對因懺悔而得救後的快樂加以形容？又有誰能夠對因無法得救而導致的無盡恐懼和痛苦加以敘述？誰又能將造福整個國家，革新全世界，解救人類於魔鬼之中，使成上帝之子，得享光榮、自由等等偉大嘗試加以適切的描繪？」⑤句句表現出傳福音的熱誠與信心。

一八一二年美英戰爭之後，此一年輕的國家，不僅在政治上合而爲一，在宗教上亦成爲一個整體。從那時候起，傳教活動在美國的基督教會界成爲固定的制度，並且維持着穩定的成長。到了一八一一年，在中國境內的美國傳教士已增至八十八人，超過在中國境內所有傳教士的半數以上；到一九〇〇年時人數更增至一千人⑥。此一傳教士數字的增長，乃是受到一八四〇年代和一八五〇年代美國「明顯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精神的影響，此一精神力求國力對內對外的擴張。在一八四四年，也就是泰勒(John Tyler)總統發起歸併德克薩斯州的同一年，一個對於「明顯命運」最具天才的牧師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表示：「對美國說，鼓舞並且表達出此一開濶而高雅的精神是如此地容易；這一個新生的、自由的、健壯的、強大的，屬於工人、民主主義者、博愛主義者、教徒和聖者的土地，必須作爲人類的代言人。美國是一個展望於未來的國家。……經由這個國家的

城市、州以及領土，美國是一個新興的、有計劃的、有偉大構想及希望的國家。美國沒有過去；它所有的是一個對未來進步與希望的展望。」⑦。

在此一精神影響之下，美國宗教團體完全支持國力擴張，因為它將為傳教工作開拓新的領域；幾乎所有的教會人士，都對一八四八年美國在與墨西哥作戰中贏得的勝利，表示興高采烈⑧。

美國內戰以後，雖然這個國家遭遇到地域、種族及各種教派之間失和的困擾，但教徒人數仍舊從一八六〇年的四百五十萬增加至一八九〇年時的一千兩百五十萬人⑨。美國新教或基督教(American Protestantism)開始從事各種宗教活動，諸如嚴守主日及禁酒等活動，並且努力從事國外傳教工作。譬如一八七二年南部浸信教會的報告裏面的一些話可以顯示出對國外傳教的熱誠：「想想看，中國將有百萬人得救，這可以提供我們一個真正崇高的理想⑩。」。迨至「鍍金年代」(Gilded Age, 1870—1898)和「進步時期」(Progressive Era, 1890's—1910's)，國外傳教工作更達到高峯。「學生海外傳教志願團」(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工作可以作為證明。此一組織創立於一八八六年，採用的座右銘是「在這一代中將世界基督教化。」此組織的成員增加極為迅速。在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間，此一組織的活動，有五萬名大學生參加，其中一萬三千人到國外傳教。這個數字佔美國所有海外傳教士數目的一半⑪。信奉基督教的學生在此時期工作的另一重大發展，乃是一八九五年在瑞典創立之世界學生基督教聯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這個世界性組織的主要成員是由美國教會領袖及教會學校學生構成。一般認為，自從

一九〇〇年以來，此組織所從事的工作及召開的會議，已成爲世界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範例，並且大多數教會活動的領導人皆來自此一組織的各階層^⑫。

一八九〇年代是決定美國未來前途——向世界擴張——關鍵性的十年。美國許多知名之士都表示，支持向外擴張。軍略家馬漢（Alfred T. Mahan）將世界分爲文明與野蠻二者，條頓族與斯拉夫族即爲二者的代表，而二者的戰場則在中國。他並且也認爲中國是一「野蠻的國家」。在德國韋廉大帝二世於一八九五年描繪其著名的「黃禍」（Yellow Peril）圖畫（警告歐洲國家來自東方的此一「黃禍」的前兩年，馬漢已經憂慮到中國的「野蠻」。馬漢解決這種「野蠻」的根本方法是非常簡單的，那就是「去中國，並使中國基督教化」^⑬。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也是主張這種擴張主義及使世界文明化說法的一分子。他在一八九八年宣稱：「凡是美國國旗飄揚的地方……永遠是爲了人類及促使文明進步而飄揚」^⑭。康涅迪克州參議員普拉特（Orville H. Platt）在同一年亦呼籲：「神的手指不是正確地指向東方，叫我們用美國的影響力來促進東方進入文明，邁向進步，來發展它的人民，並傳播自由、教育、社會秩序及基督福音給他們嗎？」^⑮。這種種有關向外擴張的聲明或呼籲很快的就影響全國。它們對於大眾的影響，可以從當時暢銷的佩爾牌肥皂（Pear's Soap）的廣告上傲慢的一段話見其大要：「減輕我們白人負擔的第一步，是教導『清潔』的美德。佩爾牌肥皂在文明前進的過程中，可作爲使地球黑暗角落光明的一個有力工具。」^⑯不過在當時美國大多數社會領袖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包括政治家薛爾茲（Carl Schurz）、哲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以及財閥

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 等人¹⁷。但是他們的意見還是被擴張主義份子及一般大眾所淹沒。

對於此一大多數人要求擴張的呼聲，美國宗教領袖亦熱烈響應。「美國海外傳教工作理事會」主席史多爾 (Richard S. Storrs) 牧師，在一八九七年宣稱：散佈基督教義乃是美國的責任，而且「每當此一想法來臨時，總有一種奇異的力量抓住我。作為上帝的最偉大的使者，這個國家際此非常時期，正在實施神的超升工作¹⁸。」當一八九八年，美國與西班牙開戰時，這種傳播基督教的熱誠，使得教會大多數信徒支持這個戰爭¹⁹。雖然若干著名的教會領袖反對美國在海外獵取財富，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支持美國在海外影響力的擴張。他們認為擴張主義 (Expansionism) 和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是不同的，前者是將美國的好處 (例如基督教、民主與自由等等) 傳授給別人，後者則是自私的圖利行為。他們一般認為美國當時所行者乃是前者²⁰。具有影響力的一本宗教性雜誌「展望」編者及基督教領袖阿伯特 (Lyman Abbott)，對於這種觀點有明顯的敘述：

「有人認為我們無權到一個未開化民族的土地去，並且干涉他們的生活。也有人認為他們情願過野蠻生活。並且有權保有這種野蠻生活。我否認一個野蠻民族有權在地球上保留任何領地。我願意重申我的看法：野蠻沒有被文明尊重的權利。文明人雖然必須尊重野蠻人很多的權利，但對他們保持野蠻的權利則不必尊重。」²¹

在一九〇〇年，「波士頓前鋒報」曾作了一項有關美國是否應該向外擴張的民意調查，調查的對象是十五個城市的五種職業團體，而牧師們在每個城市的調查名單中都是支持向外擴張的最力者。²²

在一八九〇年代到一九一〇年代的數十年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美國政治領袖皆支持國外傳教工作。麥金利總統曾明白表示：「傳教士乃文明之前鋒」^{②③}。他以前的總統哈里遜（Benjamin Harrison）是一九〇〇年「基督教傳教士會議」（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的榮譽主席，他曾經表示：「教會事業將飛躍地向前邁進而將商業拋在後面」^{②④}。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更是支持美國在中國傳教，因為那樣可以避免在中國發生革命性的動亂^{②⑤}。塔虎脫（William H. Taft）總統對於西方商人對東方人民的榨取行為的事實感到悲哀，認為這些人不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但是他對國外傳教工作則大表讚許，他說：「經由國外傳教工作，我們才可以提供當地民族一幅基督手足之情的美好景像，這才是真正的基督同情精神。因而在文明的進步過程中，國外傳教工作實在是極度地重要。」^{②⑥}

在那幾十年中，可能再也沒有其他的美國總統，會比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一個傑出的南方長老會領袖的兒子）對國外傳教工作表現的更為支持了。他在這方面所發表的言論太多，無法在此一一陳述。傳教士為了表示對此一支持的報答之情，他們對威爾遜的政策，特別是對外政策，給予無限擁護。他們支持威爾遜在中日廿一條交涉時所採的親華立場，他們支持威爾遜對德國宣戰，同時亦支持其有關國際聯盟的倡議。「教會聯合協會」（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一九一九年宣稱：「在國際關係方面，國聯在實際上，乃是一種基督教原則的運用」^{②⑦}。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項由一萬五千名牧師簽署的宣言，主張美國參議院應該毫無保留，並且不提出任何修正及保

留，儘早批准包括「國聯」部分在內的巴黎和約^②。威爾遜原來所屬之教會，即「美國南方長老會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he U.S.)，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召集了一個包括一百三十五個傳教團體及教會機構參加的會議^③，發起一個「教際世界運動」(Interchurch World Movement)，來促進世界性的福音傳播以及應付戰後世界各種挑戰^④。

一般同意，在一八九〇到一九二〇這段期間，宗教與美國民族主義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美國紐約的聯合神學院漢迪(Robert Handy)教授曾作以下簡明的陳述：「對許多美國國民和教會人士來說，基督教與美國文明似乎是如此地密切相關，以致於宗教責任和愛國熱誠就像同一個基督銅幣的兩面。在政教長久分離之後，宗教和民族主義仍然存在於密切相關的協和之中。」^⑤雙方關係的和諧，不僅由於雙方對一些重大問題諸如西方文明的未來如何等意見相同，而且亦因為雙方內在理論及組織的同一。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將美國政治上大部分的不同觀點融合起來；而對傳播福音的熱誠通常亦將各種基督教派統一起來。

但此一宗教的統一，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則開始漸漸分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美國的政治和宗教情況皆有改變。孤立主義、一九二〇年代早期的對赤色的恐怖(Red Scare)及其他戰後面對的問題，在政治上不僅阻止了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並且使美國的世界理想亦受到挫折。在宗教世界裏，由於實證主義(Pragmatism)的興起，對科學的崇拜，教派之間基要主義者(Fundamentalist)、自由主義者(Liberal)以及現代主義者(Modernist)之間的鬭爭(如一九二五年Scopes事件)

，均深深地傷害到教會的統一。另一方面都市人口增長，商業繁榮，以及物質享受的追求，更加危害到教會的精神成長^{③②}。由於這些精神上的頹廢和宗教內的分裂，美國基督教會開始衰落，這可以從以下的統計中加以證實：在一九二〇年有兩千七百個學生志願擔任國外傳教工作，但在一九二八年，數目減為二百五十二個^{③③}。至於美國政教的關係，由於教會忙於教理以及派系鬭爭，政府忙於應付戰後出現的各種不同問題，因此，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雖然相當穩定，但是已經不如往昔的親密。威爾遜總統「新自由」(New Freedom)的理想主義已成爲歷史。教會也不再高喊「在這一代中將世界基督教化」口號了。因此，政治與宗教上理想主義的消失，使得二者變成同床異夢了。

在一九三〇年代，基督教會更加式微了，除了二〇年代的教會問題繼續存在外，經濟不景氣也出現了。一些非宗教的機構諸如學校等的急速成長，已開始取代許多教會以前負的責任。另外天主教的勢力也開始加大了。這種種發展的影響，使得基督教會過去在美國人民生活中的獨佔地位爲之結束。一種多元性的文化和多元性的宗教現象出現了。爲了對抗此種不利的現象，基督教會在神學家尼布爾(Niebuhr)兄弟的領導下，一個名爲「新正統」(Neo-Orthodoxy)的運動開始了。尼布爾兄弟呼籲回復到聖經(Scriptures)和先知箴言上去求基督教的興奮^{③④}。漢迪教授對此新運動有恰當的敘述：

「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些傑出的基督教領袖，呼籲基督教和美國文明分開；他們要求重新檢討一切那些過去長久以來曾被無條件接受的事務。他們發現教會不僅未能使文明基督化，文明反而控制

了教會。」³⁵

由於宗教在美國人生活中影響力的減低，以及美國人民心力轉向其他世俗的追求，不僅基督教日漸式微，而其與國家或是政府的關係，與一九二〇年以前的幾十年比較起來，更是日益淡薄。

二、傳教士與十九世紀以來之中美關係

著作認為欲知傳教士在中美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應將其在十九世紀的心理與行為與其在二十世紀所思所為分開。在十九世紀由於受到美國對外擴張主義之影響，沾染到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優越感，以及受到愛國情緒的鼓舞，因而在中國利用不平等條約之保護，曾有一部份傳教士做出許多引起中國人民反感的事，這也是為何在十九世紀發生了許多教案事件，這當然影響兩國之間的關係，此等事實已有多種著作加以討論³⁶，在此不擬多言。不過即以十九世紀而言，許多傳教士也曾對中國之現代化運動有所貢獻。這些貢獻包括西方知識的介紹，對十九世紀晚期各種改革運動之支助（如李提摩太對康有為及梁啟超之影響），對中國婦女地位之提高，對教育之普及，亦均是有目共睹的³⁷。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傳教士對中國之貢獻幾乎全是正面的，其貢獻最大者是在政治與教育上，茲簡單敘述如左：

如前所述，在一九一〇年代，他們支持中國反對日本廿一條之要求。在一九二〇及一九三〇年代，當基督教會與國家的關係變得冷淡時，在國外的傳教地區，特别是在中國，傳教士與美國政府之間